

# 寫在書稿前面的話

我是在醫院的病床上讀完這部書稿的。我讀得很慢，花費了不少時間。這不僅因為染病的古稀之人體弱目翳，也因為回想起幾十年前的往事，難免百感交集，思緒紛雜。

對於我這樣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以往的一切，無論邪正功罪，已可下公允的歷史定論。因此，就個人而言，業已逝去的歲月早已成為陳跡，沒有多少值得留下文字的價值。一位年輕的朋友卻對我的曲折經歷感興趣，想以文學樣式錄下片段。他認為，像我這樣一個曾在舊時代生活過的知識分子，從沉淪、彷徨到覺醒的思想軌跡，對於現時青年人瞭解舊中國的一個側面，或許不無補益。這樣，我就沒有理由推諉了。

書稿擺到了面前。在文學和藝術層面，我無法提出什麼大的意見。但作為一名當事者，我可以對讀者說，這本書中所寫的主要事情，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真事。當然，出於寫作需要，撰稿者對部分人物和細節作了一些藝術加工，我想讀者和我一樣是可以理解的。

我是抗戰初期從日本回國投身抗日的，如同書中描寫的那樣踏進了國民黨軍統組織的門檻。當時，還有不少和我有著同樣命運的專家學者。我們根據對日本經濟狀況的全面瞭解，

確信自己的祖國無論在經濟戰線還是在軍事戰場上都是能夠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在經濟作戰方面，我盡到了一個中國人的努力。抗戰勝利後，軍統局在國民黨政治事務中掌握著特殊權力。我作為這個龐大的情報機構中的經濟工作領導者以及上海地區漢奸逆產處理負責人，個人進退可謂左右逢源。然而，我卻在這時陷入了極度苦悶之中。我無法理解的是，外患既已解除，理應和平建國，何以又重開戰端？我沒有能力改變時局，只能作出遠離政治舞台、擺脫軍統控制的決定。我在上海組建了當時全國唯一的經濟研究所和遍佈全國乃至東南亞的經濟通訊和信息網絡，想專心致志於利國利民的經濟研究和經濟決策。然而我想錯了，它給我帶來的是更大的困擾。

就在這時候，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接近了我，給了我以啟迪，使我在茫茫霧海中瞥見了一絲光亮。我進一步認識到，我所服務的那個政權是腐敗的，註定是短命的。到了一九四八年底，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保密局嚴令我將大批財產搶運至台灣。我不願再做愧對歷史的事，下決心將我所掌管的日偽漢奸逆產——三十七家工廠、“滿鐵”的重要經濟資料和當時價值五百萬美元的金銀珠寶，秘密而完整地交給了共產黨地下組織。

一九四九年初我去香港時，在老朋友的幫助下，從上海搶運出了一批含有大量孤本、善本的珍貴的文化遺產——七萬冊古籍，使它們免於戰火；又以自己微薄之力為新中國經濟建設作了一點貢獻，不料因此遭到國民黨保密局特務的暗害。在九死一生的關頭，中共的高級領導人董必武、楊顯東、潘漢年和揚帆同志給了我親切的關懷。我終於得以跨過羅湖橋，回到甬

育了我的大地。後來，由於眾所周知的潘漢年、揚帆冤案的牽連，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我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雖然如此，對於自己當年所下的決心，我至今不悔。一個人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卻應該把握自己的良知。如能最終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歷史，也就聊以自慰了。

歲月匆匆，在步入垂暮的時刻，我不免想起海峽那邊當年共事的朋友們。他們大多已經作古，健在的也都是耆老之人了。彼此所餘年月已經不多，不知還能在有生之日重逢相會否？昔日的恩怨已經過去幾十年，想來不該再成為不好見面的理由吧？兩邊走動走動，大家坐下來談談，以聊補思鄉思親之情，這是一個垂垂老人所希望著的。

病臥於榻，無力執筆。向年輕朋友談了這些想法，並請他們筆錄於此，權作一個當事人的讀後感。

鄧葆光

一九八四年九月

## 關於四十年後的再版

許多陳年往事，只有當你在生活的航程中顛簸許久，看遍人間世態炎涼，驀然回首時，才會讓你徒生曾經滄海之感。四十年後，這本再版的紀實小書主角依舊是鄧葆光先生。鄧老先生是一位歷經驚險磨難，承擔過大任大責，經受過大風大浪的長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採訪他時，他已年近八旬，剛從二十多年饑寒交迫和政治重壓的生活環境中掙扎出來；先是被國家推薦為全國政協委員，後來又被任命為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

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常常是坐在他家那有些局促但是陽光明媚的小客廳裏，聽他用濃郁的湖北口音娓娓道來那些飽經風霜的往事。陽光之下，絲毫感受不到他曾歷經的無數血火艱險和遭遇過的虐心悲愴。

五十年代九月的一天早晨，他在香港中環遇襲，被台灣派遣的特工連砍九刀，被送進醫院急救後昏迷了整整六天六夜。最終，他從死神身邊走了回來。以後，避禍上海。不料，四年多後，他因政治問題被牽連關押入獄七年，妻離子散，直至二十七年後再獲新生。那些年，他經歷了怎樣的人生煉獄，又有怎樣的人生思考。從他那滿頭銀髮中略能顯現出的刀疤和金

邊眼鏡後那雙深邃的眼睛裏已經很難再找到答案。一顆漂泊了幾十年的靈魂，終於找到了安放的空间。於是，在一年多的採訪和寫作後，我發表了他的故事；然後，又和朋友一起將他在香港那段驚心動魄的經歷拍攝成了電影《在暗殺名單上》。那是一個有很多共情者的時代。

鄧先生生活的時代，是祖國苦難交纏、動盪難安的時代，三百多萬軍人為國捐軀，三千多萬民眾為國殉難；狼煙遍地，命如蜉蝣。那一代人曾經的迷惘、求索、救贖、熱血和抗爭，如今，似乎已經遠去，也越來越被人遺忘。

從第一次出版這本小書到今天，已經過去四十年了。可是，無論是在熏風撲面、熠熠生輝的上海黃浦江畔，或是在溽熱潮濕、燈紅酒綠的香港獅子山下，我總會遇到鄧老先生當年的憂懼、關切和取捨；暮色四合時分，我也總是想起老先生講述過的那些陳年往事，時而動人心魄，時而又讓人嘆息扼腕。其實，傳燈遞引，那個時代並沒有遠去。江湖再見，已然是書中之人了。

肖煥偉

二〇二四年五月四日



鄧葆光 (1908-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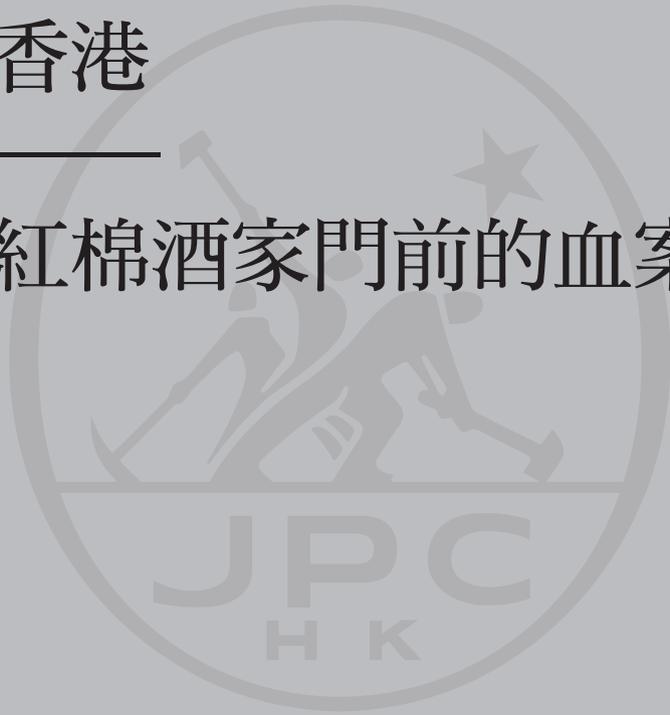
---

引  
子

---

香港

——  
紅棉酒家門前的血案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八時十二分。

香港。軒尼詩道。紅棉酒家。

路上行人稀少。三十多年前的香港遠不像如今這樣高樓林立、車流滾滾，繁華和擁擠都令人目眩頭暈。那時，比起上海來它就像一個尚待開發的港口集鎮，生活節奏也還是疲沓的，整個城市瀰漫著一種被亞熱帶的陽光曬焉了的懶洋洋的味兒。只是因為一年多來像洪水一樣湧入失魂落魄的“白華”，那些胳膊下夾著細軟珠寶、攜家帶眷逃亡的南京政府要員、上海灘大亨、廣州城的闊佬以及大大小小縣城的鄉紳和地痞，搶在穿土黃布軍裝打綁腿的黑臉膛士兵的前面，一窩蜂鑽進這個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半島，使得彈丸之地的房租一夜之間驚人地飛漲起來。空氣中滋生著令人忐忑不安的情緒。

酷熱逼人的白晝迫使香港人養成了夜貓子的生活習慣。上午九點鐘，中環紅棉酒家的夥計，打著哈欠揉著惺忪的睡眼拉開大門，準備迎接吃早茶的顧客；廚房的大蒸籠裏正冒著騰騰熱氣。台階上下，遊蕩著兩個身穿香雲衫的魁梧大漢。他們無所事事地抽著煙，彷彿等著酒家開門。

這時候，從半山的人行道上走下來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男

子。瘦瘦高高的身材，白晳清癯的面容，學者一樣自尊而從容的風度，完全不同於世代在烈日與海風中長大的黧黑瘦小的南國居民，使人一眼就看出這是一個從內地逃亡過來的“北佬”。

中年人悠悠走著，考究的金絲邊眼鏡後面浮動著若有所思的目光。在他身後，木棉樹的濃蔭下，不近不遠處有兩個壯漢。他們尾隨著中年人，佯裝悠閒自得卻又警惕四顧的神情令人感到形跡可疑。

那沉思著行走的中年人全然沒有發覺自己已陷入危險處境。尾隨盯梢的兩條漢子交換了一下目光，突然加快了腳步。紅棉酒家門口的兩個男人也開始迎了上來。

突然，一聲尖銳的唿哨，前後四條壯漢同時撲向中年人，從懷裏抽出鋥亮的菜刀劈頭蓋腦砍去。中年人本能地用胳膊護住腦袋，左閃右晃幾下，撲過去抱住一個兇手。那兇手使勁掙脫開，隨即又揮刀砍去。一聲慘叫，中年人倒了下去。這四條漢子一人又砍了兩刀，一聲唿哨，剎那間逃得無影無蹤。這一場兇殺案，前後只有十幾秒鐘。紅棉酒家那個開店門的夥計，還沒弄清發生了什麼事情，就已經結束了。以至於後來巡捕再三盤問，他什麼也說不上來。

當巡捕吹著警哨飛步奔來時，中年人已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他們從浸透了腥血的衣服中搜出一張名片：

香港寶豐行經理鄧景行

地址：告士打道二百二十八號。電話：二七九二三。

火速趕到現場的巡捕房探長，沒費多少力氣就下了判斷。兇手作案的乾淨、利落和神速，足以說明這是一樁有組織有預謀的兇殺案。兇器是菜刀而不是手槍或匕首，更說明組織者的老練和周到。萬一失風，便可以編造一個私怨尋仇甚至是風月鬥狠的故事，從而掩蓋真相。

第二天，《香港日報》《星島晚報》《華僑日報》，紛紛在頭版顯著位置報導了這起血案。精明的記者不知從什麼渠道打聽到，被害者鄧景行，原係國民黨軍統局少將、經濟作戰方面的負責人，真名鄧葆光。對於這個名字，從上海逃港的達官顯貴以及巨賈富豪們並不陌生。此人是抗戰勝利後，戴笠派往上海的首席接收大員，在上海經濟界曾是顯赫一時的幕後實力人物。他所主持的“東方經濟研究所”，擁有銀行、電台、報紙、通訊社、商行、圖書館、印刷廠、書店、運輸行、米店、金號、證券號等龐大商業機構。更令人矚目的是，研究所的理事長係無人不曉的“海上聞人”杜月笙，名譽所長則是被人們譽為蔣介石“文膽”的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蔣介石私人秘書陶希聖。

受害人的這一政治背景，使得紅棉酒家門前這起血案顯得神秘而複雜。香港警方聯想到半年前原國民黨陸軍大學教育長、上將楊傑也在這條軒尼詩道上的寓所內遇刺。他們不得不審慎起來。這起血案是經濟糾葛，還是政治謀殺，或是情場爭鬥？作案的是本地黑手黨，還是台灣的殺手，甚至如傳聞那樣是共產黨“紅隊”？

這鄧葆光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